

湖南人

壺籃滅怪圖

甲仗肅天兵。虎豹張牙誰敢犯。

籃轟楚寶。豬羊碎骨永無聲。



PROVINCIAL
PATRIOTS

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

[美] 裴士鋒 (Stephen R. Platt) / 著

黃中宪 / 译 譚伯牛 / 校

湖南人
中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湖南人
与
现代中国

PROVINCIAL
PATRIOTS

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

[美] 裴士锋 (Stephen R. Platt) / 著

黄中宪 / 译 谭伯牛 /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美)裴士锋(Platt, S. R.)著;黄中宪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1

ISBN 978-7-5097-7817-3

I. ①湖… II. ①裴… ②黄… III. ①历史人物-研究-湖南省
②中国历史-现代史-研究 IV. ①K820.864 ②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7106号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

著 者/[美]裴士锋(Stephen R. Platt)

译 者/黄中宪

校 者/谭伯牛

出 版 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段其刚

出 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 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 张:9.5 字 数:219千字

版 次/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97-7817-3

著作权合同
/图字01-2015-4089号

登 记 号

定 价/52.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文版自序^{*}

尽管这是我在中国出版的第二本书，但事实上，它是我在开始写作《天国之秋》之前就已经完成的第一本个人著作。这本著作源自于我的博士论文，在经过修订之后，于二〇〇七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所以，它呈现的是我在学术界初出茅庐阶段的研究成果，反映的是我最初决定投身历史学领域时期的研究旨趣。

出于个人原因，我对中国的兴趣就产生于湖南。大学毕业之后，作为雅礼中学的英文教师，我在长沙度过了两年时光。自那以后，我常常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与那片土地密不可分——湖南是我的第二故乡，那是我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那里有我的朋友和学生。湘菜和湖南的大好河山令我着迷，直到今日，我花在游历湖南的时间远远多于任何其他省份。

虽然直到我申请耶鲁大学雅礼协会项目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听说湖南。但在此之前，我的家族早已与这一省份产生联系。事实上，我父亲的伯父（我的伯祖罗伯特）早在一九一五年就生活在长沙，他是耶鲁大学雅礼协会项目最早期的英文教师。在我出生前几年，他便已去世，所以我没有机会当面问他当年的经历。所幸我还能看到他拍摄的照片，阅读他写的家书，因而，我也能对他的生活感同身受。

这些家书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一九一五年的长沙，这也使得

* 中文版自序译者：董风云，法国孟德斯鸠-波尔多第四大学国际关系硕士。

我记忆中一九九〇年代的那一段经历变得无比鲜活。伫立在街边，看长沙车水马龙，我想到了伯祖：八十年前，他像我一样风华正茂，站在相似的地方，望见一片旌旗招展，那是人们在庆祝袁世凯登基的典礼。他的家书丰富和加深了我的个人体验，促使我第一次真正对历史学产生浓厚兴趣。

从长沙回国数年后，我开始了在耶鲁大学中国史研究所的学业，湖南毫无悬念地成为我的关注重点。鉴于我对这一省份的莫大兴趣，我无法不注意到，如此多的湖南名人在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动荡岁月里、在改良和革命的道路上，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

然而，我所接触的主流中国史作品，几乎众口一致地认为“现代中国”发轫于文化精英中心——如北京，以及沿海对外中心——如上海和广州。与此相反的是，湖南被普遍描述为一个偏僻、落后，必然从北京和沿海地区引入“现代”精神而加以启蒙的内陆省份。我深知那只是一叶障目，于我而言，似乎可以写就一段完全不同的关于现代中国诞生的历史，那便是将湖南置于故事的中心，而非无关痛痒者。事实上，先后诞生曾国藩与毛泽东的省份，似乎完全有理由来尝试以一个新的方式讲述古老的故事。

通过这本书的研究工作，我想要更清楚地厘清贯穿晚清和民国初期湖南几代行动主义者和领袖的线索。在每一代中，我着重考察少数几个看起来尤其重要和有趣的人物，通过他们的话语和著作理解他们。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湖南人身份？他们如何思考湖南在未来中国潜在的角色？当中国首先面临列强瓜分的威胁，而后又产生军阀混战的局面时，他们的湖南根源有怎样的重要性？

最为重要的是，我想要理解当地的抵抗与牺牲传统，它激励了无数年轻的湖南行动主义者迈出无畏的步伐——在很多情况下，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来创造一个他人可以活得更好的幸福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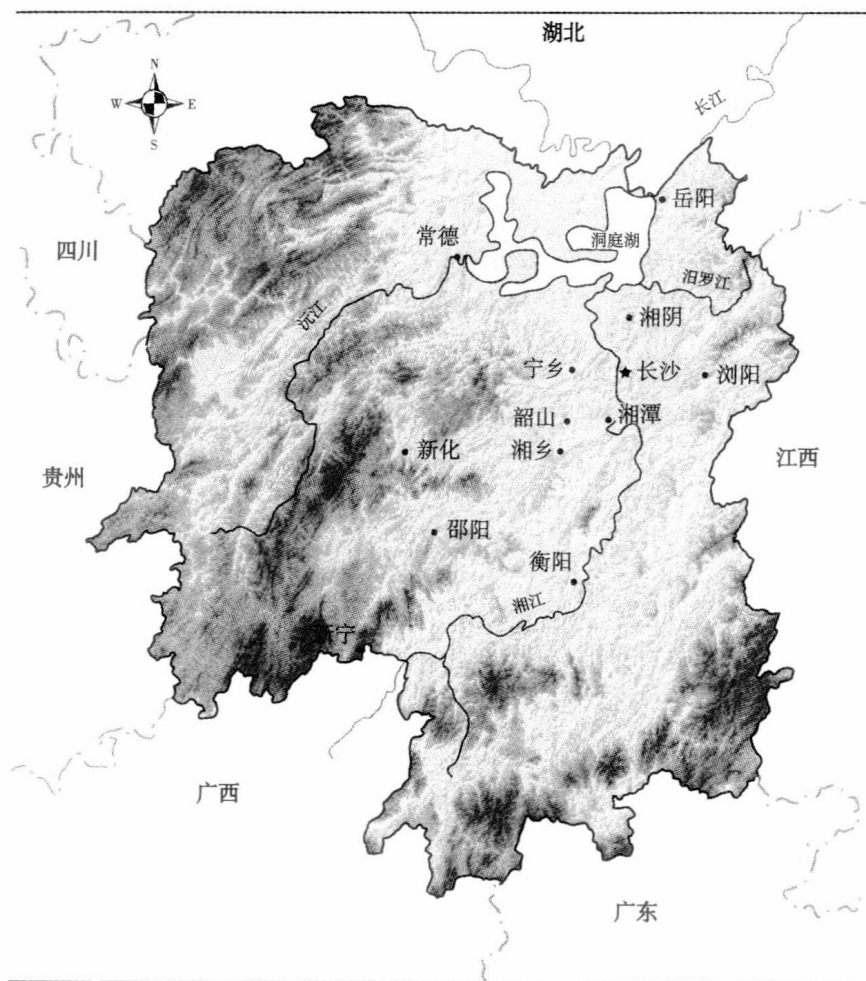
当我写成《湖南人与现代中国》的时候，我将其献给我的父母和妻子。虽然这一目的仍然适用于英文版，但我要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中文版，因此，我才可能将本书第一次献给那些在中国的人们。它让我有机会满怀深情地回想起那些和蔼可亲的人们，那些在我二十多年前初来乍到时助我形成生命观点的人们，那些打开我双眼使我重新看待世界并走上一条我从未想过的道路的人们。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敬意，我将此书的中文版献给我在雅礼中学时的同学和老师。

二〇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北安普顿，马萨诸塞

市民呵！起来。创造未来湖南的黄金世界只在今日。

——毛泽东，一九二〇年十月七日



目 录

导论：为中国构想另一种未来 / 001
第一章 重新发掘王夫之 / 006
第二章 湖南复兴的基础 / 033
第三章 湖南维新运动 / 065
第四章 在日本重整旗鼓 / 095
第五章 湖南与清朝的覆灭 / 128
第六章 重建 / 160
第七章 毛泽东与湖南自治运动 / 190
跋：湖南与中国 / 224
注 释 / 233
致 谢 / 283
索 引 / 285

导论：为中国构想另一种未来

怪哉，湖南人在近代中国的事迹从未被当作整体来看待。¹个别的历史著作可能在行文中顺带指出，太平天国之乱（说不定是人类历史上死伤最惨重的冲突）的平定，乃是由湘军领导完成。或指出一八九八年北京师法日本明治维新改造中国，推动了三个月的“百日维新”，但其实在那之前三年，湖南就已施行类似的改革。百日维新失败，改革派遭捕遇害，其中最著名的殉难者谭嗣同，就是湖南维新运动的创始领袖。或会提到二十世纪第一场反清大叛乱的诸领袖，有一半是湖南人。又或指出领导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同盟会，湖南籍成员居各省之冠，湖南人黄兴作为领导者参与这场革命的程度，远比事后得到大部分功劳的孙中山高。更近一点看，中国共产党第一届政治局的成员，整整四分之一是湖南人（包括毛泽东）。^①但不论是这些说明湖南人对中国近代史进程有着非凡影响力的例子，还是其他例子，都是零落、孤立地出现，缺乏连贯性，几乎只是徒然地引人惊讶，而无法给予真正的解释。对此现象，历来的解释就只是含糊提及湖南人的神秘“精神”，有人推测那精神源自湖南多山的地理环境或爱吃辣的习惯。^[1]

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尽管近代中国几乎每个重要的改革或革命团体的领导阶层里，都可看到湖南人的身影，但我们仍

^① 1927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始设政治局，共8名委员，其中蔡和森、李维汉为湖南籍，毛泽东并非委员。——编者注

- 2 把湖南视为保守落后的地方。湖南予人的传统印象，乃是中国最排外的省份，是粗野之地，湖南的农民抗拒任何改革或进步思想，但这样的省份却出了这么多改革者和革命人士，似乎说不通。本书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矛盾之所以让人觉得吊诡，完全是因为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建立在一种普获认可但其实有待商榷的看法上：中国的现代性和随之而来的所有政治与社会改革、民族主义、全球文化交流完全是沿海通商口岸的产物，且从那些口岸向内扩散，启迪了内陆。^[2]在接下来几章里，我会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湖南其实是不为传统所拘的文化中心，是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一个自成一体的节点。我们的目光停在通商口岸和首都太久，暂时转移一下视线，把湖南摆在中央，全新的中国近代史叙述随之呈现眼前。

在这一与主流叙述背道而驰的反叙述里，始于晚清的诸多湖南人的行动主义事例，其发生都绝非偶然。我的研究目标之一，乃是揭露上述诸多不相干运动之间一脉相承的东西，特别是揭开诸主事者的个人关系——师生间、作者与读者间、军中同袍间、同学间、后代子孙间与堂表兄弟姊妹间——他们因此被拉进一自觉的传统和一有意义之整体。我想弄清楚这些人如何理解他们自己的省份，以及其省份与外面世界（包括中国其他省、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中国近代史上那些家喻户晓的事件，对他们而言有多么不同？是什么激发他们付诸行动？湖南的历史学家所缅怀的是什么，哪些人是湖南青年效法的对象？他们对未来有何梦想？总而言之，湖南的行动主义者如何解读晚清直至清朝覆灭期间中国大地上的动乱和走得踉踉跄跄的建造新民族国家之路？研究发现，这些疑问的答案与我们预期的大相径庭。这使人不禁想问，今日学界对中国近代历

史之由来究竟了解多少。

我要讲的故事，围绕着两个主题铺陈。第一个是湖南人的民族主义。在此，我所谓的“民族主义”兼具两种流传于湖南的想法：第一种想法认为，湖南人是一个自成一格的群体，有着与中国他省人迥然有别的共同特色；第二种想法认为，湖南人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有共同的先祖，以及最重要的，有共同的历史命运。那是种时强时弱的民族主义，弱时主张湖南人负有引领中国其他人步入未来的天命，强时则主张湖南人应该摆脱中国的束缚，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而从近代中国主流叙述的角度看，这一现象根本不该存在。传统的中国近代史认识告诉我们，儒家忠君爱国的观念自然而然转化为对中国大一统的向往，于是顺理成章的，中国知识分子无一不怀抱着中国一统的梦想。这一历史目的论（historical teleology），乃是由想以近代民族国家的形式保住古老帝国版图的中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所构造，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许多重要的湖南改革派只把湖南省当成首要效忠对象的事实，却恰好在掏空这个立论。本书检视的许多例子里，有一个一贯且有力的中心思想，即本省摆第一位，帝国（如果考虑到帝国的话）摆第二位。从中国境内民族主义发展的角度看，这意味着湖南省可同样轻易地（且如某些人所认为的，更轻易地）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把旧帝国弃之在后。或者如某湖南学生于一九〇三年所说的，湖南人应该让中国步罗马帝国之后尘消失于历史舞台，湖南本身则要成为法国或英国之类的国家，把旧帝国的文明带进未来。

第二个主题与第一个密不可分，乃至今仍方兴未艾的对湖南学者王夫之的重新发掘。王夫之是明朝遗老，义不仕清，十七世纪隐居乡野，其生平和著作于十九、二十世纪成为建构新

4 湖南认同和历史方向感的核心材料。王夫之比其他任何人或历史事件更有资格作为现代湖南人性格的原型，在许多人眼中，王夫之是在他们血液里事先植下改革、革命因子的共同先祖。读者或许会注意到，我对王夫之的探究，并未走从哲学角度分析他著作的传统路子，而是研究近代人如何响应他的想法，如何在他思想的基本要素和进步、民主、民族主义之类的“西方”思想之间找到不同寻常的契合之处。^[3]本书是探讨思想历史的专题论著，但具体地说，这是一部以如下信念为基础的论著：思想不是抽象且不变的，而是有所待（contingent）且处于动态变化中的。我认为了解思想史的最佳之道，乃是把思想史摆在人的时空环境（human context）里去了解，这个时空环境包含了受自己生命中特别关注之事物驱动的读者塑造文本的意义以满足自己需求的方式，以及他们接下来将之解读并化为行动的方式。在这样的探究路径下，引述文本此时所具有的意义，至少就和该文本起初被撰写的那一刻同样重要。因此，本书不是在研究王夫之的思想本身，而是在研究王夫之的著作如何被后人运用：近代学者如何复兴他的著作，如何重新解读他的著作，又如何数个世代的岁月里把他转变为令人仰慕的现代湖南精神象征。用此思想研究路径来探讨上述主题，可以说再适切不过，因为王夫之也非常重视文本意义经时空转换而改变的类似观念。

最后得谈谈我个人的地区史研究方式。这不是第一本出自西方学者之手的有关湖南的书，却是第一本避免把湖南当成个案研究（case study）的书。已有人写出把湖南当作近代中国缩影的出色著作，而要掌握整个中国的趋势，这是较容易办到的研究路径。^[4]但就本书的目标来说，湖南不是中国的缩影，

就像中国不是亚洲的缩影；湖南就是湖南，是一个在湖南人心中独一无二的地方，湖南史与近代中国史不可分割，但不可分割不代表类同。这两种研究路径的差异在于：把湖南当个案研究，就是在强调当地历史里最容易被归纳出来以适用于其他诸省的元素，或者对今人所知之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似乎是最有助于阐明该过程的那些元素；但把湖南视为本身自性具足的一个主体来看待，则是要为湖南历史里该省所独有且与熟悉的叙述格格不入的诸多元素腾出空间。简单地说，第一种研究路径用该地区来小幅调整既有的中国近代史模式，以使其更为完善，第二种则用该地区来质疑该模式。

这是南辕北辙的两种原则，各以其中之一来做研究的两个学者，可能在同样的原始资料里找到截然不同的含义，且会选择循着那些资料所展开的截然不同的主线走下去。两人很容易会对另一人眼中最有趣的事物视而不见。但如果把他们的研究项目摆在一块，两种视角能创造出大不相同但彼此相当有关联 5 的画面，且足以发挥类似立体镜之两张幻灯片的作用，真正深刻地呈现那些活在另一个当下、不可能知道自己未来的历史人物那充满矛盾的经历。本书所探讨对象的希望、梦想、背道而驰的意念、挫折，始终未呈现于我们所了解的中国历史，主要因为它们反映了一个已湮没不明的、充满诸多可能性——为中国构想另一种未来——的世界。那是日后笃定认为一切都通向大一统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所无法理解的世界，也正是我以那些历史人物为对象写下此书的原因所在。

第一章 重新发掘王夫之

8 据认识邓显鹤的曾国藩所述，邓显鹤搜罗、刊布家乡湖南的文献，其搜讨之勤“如饥渴之于食饮”。而当邓显鹤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这份工作时，没什么文献可供他搜罗。因为明清数百年间，湖南产生的著名学者甚少，从当地通过科考成为举人和更上层楼成为进士的士子人数来看，湖南在诸省中也几乎是敬陪末座。他省人喜称湖南人为“骡子”，借以形容他们吃苦耐劳且固执的个性，但这种个性的人里面几乎出不了流学者或领导人。^[1]

但在一八一〇年代，邓显鹤从某文献里读到一本明朝佚书《楚宝》，书中宣称这本书收录了他家乡所在地区历来出过的诸多大儒、名臣的传记，年代从公元前四世纪湖南地区为楚国南部之时起，经公元前三世纪楚国灭亡，再经历诸多朝代，直到公元十四世纪明初为止。那是本不折不扣的地区性历史著作，完全不受省、国、帝国之疆界变动的影响。^[2]邓显鹤花了十余年时间寻找该书，最后终于在湖南商业城市湘潭的某处私人藏书里找到一孤本。^[3]为这一发现欣喜若狂的他，校订此书，重新刊行，并增添新词条以将后来的湖南先贤也纳入其中。经他增辑的新《楚宝》于一八二九年刊行，列出从楚国至十七世纪明末这两千年间湖南的历代贤人。

9

《楚宝·文苑》开头介绍楚国著名大夫屈原的生平。邓显鹤说明道，屈原的著名诗篇《离骚》是第一首“振南国之风”的诗作。^[4]屈原在朝中遭谗，遭出卖，被贬至楚国南方（长沙

附近)，在那里成为后代无数人心目中忠君爱国、孤单寥落的浪漫象征。《楚宝》介绍屈原时引用了他的诗句：“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5]然后说道，当秦国大军入侵他所挚爱的楚国时，屈原投汨罗江（湘江支流）自尽。

《离骚》以如下的著名诗句结尾：

乱曰：已矣哉！

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6]

彭咸是个巫师，也是楚国南部地区的象征，这一节诗描述屈原以不屈服的心态拥抱被流放到未开化的南方荒野的人生。楚国被灭后，此国以荒蛮之地、巫师与巫术之地、浪漫文化之地（此浪漫文化已佚失，只有在诗歌中还可窥见，而屈原为其悲剧缪斯），为后世中国人所缅怀。屈原自尽一个世纪后，汉朝大臣贾谊，因宫廷阴谋，一如屈原被贬到湘江流域。有感于屈原的遭遇，他写下《吊屈原赋》回应《离骚》，赋中他发出同样的感叹：“已矣，国其莫我知兮。”^[7]邓显鹤《楚宝》中论屈原的部分，以对贾谊的一段描述作结：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①。

《文苑》门一章以屈原为始，以将近二千年后另一位同样悲剧性的人物作结。此人就是忠于明朝的学者王夫之。被邓显鹤称为“我师”的王夫之，二十五岁遭逢明亡清兴之变 10

① 作者谓此语引自“邓显鹤《楚宝》中论屈原的部分”，其实是《楚宝》编纂者周盛楷照录了司马迁的《屈原列传》。邓显鹤对《楚宝》所做工作，是为每卷增加了《考异》与《增辑》，并未增删周氏编纂的历代传记。——校者注

(一六四四年)。邓显鹤写道：“北京陷，夫之涕泣不食者数日。”^[8]邓显鹤详细描述了明朝甫亡之时王夫之的生活：游历华南寻找尚存的明朝皇族，找到皇族，在西南与之共同抗清，然后满腔希望禁不住现实摧折而破灭。诚如邓显鹤所述，流亡朝廷的内斗和出卖，最终使王夫之决定隐迹江湖。

王夫之回到故乡湖南，回到深山中的老家“续梦庵”。他将在此度过余生，过着与屈原、贾谊有诸多相似之处的幽居流放生活。王夫之本人也体认到这相似的遭遇，曾写道：“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乡，而遭闵戢志，有过于屈者。”^[9]王夫之未如屈原自杀明志，而是在湖南中部山中度过了四十年隐士生活，钻研中国传统典籍（史书、哲学著作、儒家经籍），追索明亡之因和天下拨乱反正之道。

在《楚宝》中，邓显鹤引用了王夫之自撰的墓志铭：

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
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
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10]

但邓显鹤于一八二九年哀叹道，王夫之的著作（他“衔恤”——永久之悲——的体现）已佚失。他写道：“先生家故贫，著书笔札多取给于故友及门人家。书成，因以授之，不自收拾，藏于家者盖无几焉。”邓显鹤指出，他能看到的王夫之著作不多，于是以如下的恳求，作为王夫之这一词条和论楚地文人这一章的结尾：“安得士夫家有珍藏全部善本，重为审校开雕，嘉惠后学，使湖湘之士共知宗仰！”^[11]

11 一八三九年，即《楚宝》刊行十年后，邓显鹤的愿望成真。那时他已把注意力转向湖南较晚近的历史，正在编辑、扩